

战略文化在俄罗斯 对外政策中的作用与意义

〔俄〕德米特里·索洛维伊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研究俄罗斯传统战略文化对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作用与影响。战略文化为政治精英提供对外政治决策的总体框架、依据和逻辑。战略文化植根于文化、历史和国民认同，并以半自动和无意识的方式发挥效力。俄罗斯战略文化的基本构成是欧洲文明认同、历史遗产、国民认同以及战略忍耐思想，但对外政策的具体选项取决于形势评估、对外政策中的力量平衡和决策精英的心态。本文探讨了俄罗斯战略文化在俄罗斯领导层具体对外政治决策，首先是处理乌克兰问题方面的表现。俄罗斯战略文化对中国的地位及影响予以单独考虑。本文指出，俄罗斯战略文化将俄罗斯视为欧洲国家，相对于俄罗斯的西方坐标而言，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属于次要性质。现有俄中关系可界定为“有限伙伴关系”，原则上不可能产生新的特质。非但如此，鉴于中国实力增强，俄罗斯迟早会寻找新伙伴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对于俄罗斯战略文化中可能保留或急剧变化的要素，本文也进行了预判。

【关键词】 战略文化 俄罗斯 克里米亚 战略忍耐

【作者简介】 德米特里·索洛维伊，俄罗斯外交部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大学）社会关系教研室主任，历史学博士。

【译者简介】 王嘎，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俄罗斯最高领导层如何采取对外政治决策，是引发学术兴趣并具有实践意义的重要问题。在国外和俄罗斯观察家看来，此类决策经常出乎预料。这里说的是强烈影响世界政治的举措，例如，克里姆林宫于2014年春季决定将克里米亚收归俄罗斯，以及2015年秋季在叙利亚开展军事行动。

克里姆林宫关键性的对外决策是由极少数人士秘密制定的。为预判俄罗斯对外政策，应当理解俄罗斯领导人的逻辑与动机。

笔者认为，三个基本要素决定着俄罗斯在外交领域的决策：（1）俄罗斯精英的战略文化；（2）统治集团的认同感；（3）普京总统的个人因素。战略文化为对外决策提供总框架和逻辑，本文将对此展开分析。

何谓“战略文化”？

“战略文化”概念由美国研究者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①。战略文化可概括为各种观点、信念和精英在对外政策及所谓“大战略”方面的立场之总和。战略文化问题已有诸多研究成果^②，与本文相关的有以下三种重要观点：

第一，战略文化以“半自动”方式影响安全及对外政治领域的决策。也就是说，选择这样或那样的决定，看上去往往自然而然，而又不言自明。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及其多年合作者阿莫斯·特维尔斯基的解释适用于上述观点。按照他们的研究，人类同时拥有两种思维系统：直觉式的自动系统、分析式的反应系统。自动系统的反应直接出于直觉，无须经过思考。一个普遍的情形是，我们首先做与（或者）说，然后才意识到，我们说了或做了什么^③。在对外政策中，决策的直觉方式源于人们所接受的文化。

2008年8月，为控制南奥塞梯，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爆发了所谓“五日战争”。针对俄罗斯的行动，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召开会议，讨论应对方案，与会者均主张作出军事回应。在此情形下，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文化发挥了作用：抛弃共产主义的俄国，对其予以果断还击。唯有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蒂芬·哈德利提出疑问，打断与会者的发言：“难道我们真的要为格鲁吉亚而与俄罗斯展开一场战争？”此后，与会者方才意识到各自的过激反应^④。

第二，战略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以历史遗产为基础。国家在先前时期的行为，强烈影响着其现实与未来的行为。这也可称为历史的套式。

历史上，波兰曾与俄国争夺霸权，希望获得在东欧的主导地位。结果是，波兰于17世纪输掉竞争，并遭到俄国、奥匈帝国和普鲁士三国瓜分。1939年，波

^① Snyder J.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Nuclear Options*.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77.

^② 对战略文化概念简明扼要的梳理，可参见 Алексеева Т. 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эволюция концепции//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2. № 5.

^③ Kahneman, Daniel. *Thinking, Fast and Slow*.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p. 533.

^④ Михаил Зыгарь, *Вся кремлевская рать: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17. С. 460.

兰陷入斯大林的俄国和法西斯德国的挤压。换句话说，数百年以来，波兰始终是俄罗斯及德国的敌对面。

21 世纪初，波兰力图成为中东欧地区经济与政治的非正式领导者。在欧盟和北约框架内，波兰与德国之间矛盾频仍。该国也将俄罗斯视为地缘政治威胁。由此可见，在新的时代和新的条件下，波兰精英再现了地缘政治行为的历史套式。

第三，战略文化中浓缩着一个国家的国民认同观念。认同感的作用方式如同历史套式，即预先倾向于某种特定类型的对外政策。

美国战略文化的要义就在于，深信美国的特殊使命，深信其有权利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和别国的样板。近十五年至二十年间，此种信念在美国对外政策的若干变体中均有所体现。小布什是全球优势概念和强硬立场的支持者，主张强有力的行动，包括单边行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支持中东及后苏联空间的强制民主化。与之相反，奥巴马主张一种“明智的”（smart）世界领导地位，认为美国应以明智的政策而非强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性情多变的特朗普更倾向于施加经济压力，而对伊朗之类的“危险国家”则诉诸武力威胁。然而，在种种对外政策的具体方案背后，却树立着一个共同的思想——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和主导作用。

美国战略文化这一要素的极端稳定性，来源于美国的国民认同感，亦即大众情感。美国国民自认为负有特殊使命，有责任引领世界迈向民主与繁荣。笔者强调一点：这恰恰也是美国精英所表达的一种大众情感。

分析战略文化，关键是要理解，战略文化提供对外政治的总体框架、逻辑和依据。但对外决策具体方案的选择终究取决于形势评估、对外政策中的力量平衡和决策精英的心态。

俄罗斯战略文化的基本要素

俄罗斯战略文化包含几个基本要素：文明认同、历史遗产、国民认同、战略忍耐思想。这些要素能够提供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总体框架，确定克里姆林宫的行为动机和逻辑。现对这些思想细述如下：

文明认同 俄罗斯精英历来认为自己的国家是欧洲国家——既非亚洲的也非欧亚的，而是欧洲的。社会调查表明，俄罗斯社会基本上也认为俄罗斯属于欧洲国家。

与此同时，在现代俄罗斯精英看来，俄罗斯的欧洲属性意味着，欧洲应当承认俄罗斯是欧洲的一部分，但俄罗斯并不打算接受欧洲的价值与准则。换句话说，俄罗斯精英想成为欧洲精英的一部分，像西方人一样生活美好，将钱款存入西方，在那里度假和教育孩子，而治理俄罗斯则需要本土的——非自由和非西方的——准则。这就是说，俄罗斯精英选择欧洲作为文明认同，同时又为本国选择了威权模式。

选择威权发展模式，导致俄罗斯精英向中国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靠近。但精英和社会并不承认俄罗斯为亚洲国家（关于中国在俄罗斯战略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下文将有更详尽的探讨）。

俄罗斯文明认同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俄罗斯自身如何看待自我；第二，俄罗斯如何看待别国。就此而言，俄罗斯的地位颇为吊诡。纯粹从地理学角度来看，俄罗斯同时是欧洲和亚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但西方却不认为俄罗斯是欧洲国家，而亚洲也不认为俄罗斯是亚洲国家。

鉴于俄罗斯精英不愿承认自己属于亚洲，那就只剩下一条出路：促使欧洲承认其为欧洲国家。

争夺历史遗产 俄罗斯帝国与苏联的欧洲属性，由领土与政治的向西扩张而得以证明。首先将乌克兰纳入俄罗斯国家版图（17世纪后半叶），继而是波罗的海和摩尔达维亚。建立对东欧与中欧的战略控制出于两个目的：其一，确保俄罗斯向欧洲推进，并积极影响欧洲政治；其二，针对西方可能发起的进犯，展开战略反攻。西部边界离莫斯科越远，敌人就越难以突入俄罗斯心脏地带。

苏联解体以及波罗的海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不仅在地理上拉开了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距离，而且将战略威胁大幅度地推向俄罗斯边境。然而，对俄罗斯而言，在欧洲文明认同方面最重要的国家始终是乌克兰。乌克兰一旦加入北约，对俄罗斯就意味着关键历史遗产的丧失。故而克里姆林宫认为保持对乌克兰的影响至关重要，俄罗斯不能容忍乌克兰向西方的政治偏移。

2008年，在北约布鲁塞尔峰会上，普京公开发出警告，乌克兰如果加入北约，将面临失去克里米亚和东部领土的风险。

在与小布什的一次闭门会议中，俄罗斯总统就乌克兰问题发表了更为直露的言论。米哈伊尔·济加尔在《克里姆林宫的整个队伍》一书里引用了普京的语句：“乌克兰根本不是一个国家！它的一部分领土属于东欧，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赠送的！既然乌克兰要加入北约，那就别想要克里米亚和东部，总有一天，

它会分崩离析。”^①

1991年，克里姆林宫开始重新评判乌克兰国家，依据的却是先前的历史。它将乌克兰视为一个偶然获得独立的国家，一个失败国家（failed state），充其量为有限主权。在克里姆林宫看来，乌克兰乃至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均属俄罗斯势力范围。

有关俄罗斯势力范围的议题，并非普京执政以来的新事物。叶利钦总统一直持有类似其继任者普京的观点。2018年8月出版的比尔·克林顿与鲍里斯·叶利钦会谈记录即是明证。叶利钦的看法完全符合俄罗斯传统战略文化。

1995年，叶利钦发表言论，强烈反对北约东扩，认为这是对俄罗斯的侮辱，也是对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威胁。

1996年4月，叶利钦警告克林顿，共产党人如果赢得总统选举^②，就会将克里米亚重新纳入俄罗斯版图（共产党人其实并未打算这么做。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收回克里米亚的构想始终在俄罗斯政治讨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1999年11月，叶利钦与克林顿会晤时强调，俄罗斯是欧洲国家，正是俄罗斯而非美国才有责任保障欧洲安全，而且还说：“比尔，比尔……你就把欧洲让给俄罗斯吧。美国不在欧洲。欧洲应当由欧洲人管理。……我住在莫斯科。莫斯科是欧洲，我喜欢这一点。你可以把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拿去并保障它们的安全。我只要欧洲，它的安全我来保障。”^③

叶利钦与普京的区别在于，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当政期间，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和财政上处于弱势。俄罗斯得到美国和一些国际组织的援助，并极度依赖于此。因而叶利钦不能公然反对美国，宣示俄罗斯的野心。直至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走出危机，实力大为增强，才亮出独立立场，向美国发起挑战。

事实上，无论普京还是叶利钦，均以俄罗斯战略文化为思想出发点。只不过普京有机会实现这些思想，而且采取了具体的行动。

国民认同也影响着俄罗斯对外政策。对俄罗斯人的国民认同而言，将俄、乌、白三个民族在族群、语言、历史及文化上视为一体，乃是最具代表性的观念之一。除此之外，俄罗斯人还有着相对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民族的心理优越感。

^① Михаил Зыгарь, *Вся кремлевская рать: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С. 445 – 446.

^② 此次大选于1996年夏季举行，结果是叶利钦胜出。

^③ Что мы узнали из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х разговоров Ельцина и Клинтона; главное (31 августа 2018 г). <https://rtvi.com/stories/chto-my-uznali-iz-rassekrechennykh-razgovorov-eltsina-i-klintona-glavnoe/>

在俄罗斯民众心目中，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始终是俄罗斯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现今的独立，实属历史的误会。在俄罗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被视为外省俄罗斯人，他们的语言则是变形的俄语，相比俄罗斯文化，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文化无非是外省文化。这就是说，俄罗斯精英认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是有限主权国家并完全依赖于俄罗斯，此种战略观念具有以俄罗斯大众认同为形式的牢固基础。

在俄罗斯战略文化中，“战略忍耐”思想或许是最关键也最著名的一个环节。俄罗斯精英相信，面对外部威胁，俄罗斯民族甘愿无限期地忍耐损失与痛苦。俄罗斯经济发展虽则滞缓，却稳定可靠，成功地适应了一系列制裁，为保持稳定积累了大量储备。或早或迟，机会的窗口必将向俄罗斯敞开，俄罗斯将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便是俄罗斯精英对未来的看法。

2016年年末，战略忍耐思想一度收到了成效。欧盟内部危机与英国的退出，以及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似乎为俄罗斯打开了机遇之窗。俄罗斯领导人有意与美国新任总统就一些基本战略问题展开商谈。首先是克里米亚的新地位问题和承认后苏联空间为俄罗斯势力范围。然而，由于美国内政状况所限，特朗普总统并没有机会与普京总统缔结交易，甚至严肃的协商也不可能。

这扇机遇之窗因而迅速关闭，但克里姆林宫并未放弃希望，反而认为，战略忍耐路线迟早会引领俄罗斯获取胜利。

现今阶段，按照克里姆林宫某些战略家的观点，在俄罗斯针对乌克兰问题的决策方面，战略忍耐思想已然接近成功，西方因基辅没有能力实行改革而感到失望。

战略文化与对外决策评估之间的相互作用

论及俄罗斯对外战略对乌克兰问题的处理，笔者以战略文化对决策过程的影响作为例证。

2013年11月，乌克兰爆发了反对亚努科维奇总统的运动，起因是亚努科维奇不愿签署与欧盟联合的协议。克里姆林宫将这场运动视为美国破坏活动的结果，这些活动意在使俄罗斯与一个对其至关重要的原苏联国家相分离。俄罗斯著名的敌对者、参议员麦凯恩和美国助理国务卿纽兰先后来到基辅的抗议人群中，在莫斯科看来，这正是美国煽动乌克兰革命的证明。米哈伊尔·济加尔写道：

“普京深信，基辅发生的所有事件，均属美国人策划的行动之结果。”^①

普京将乌克兰局势视为对其本人的挑战：他提醒美国人不要逾越“红线”，并且表示，“乌克兰这一人工产物”加入西方的同时，将失去俄罗斯赠给它的克里米亚。俄罗斯不允许塞瓦斯托波尔——俄罗斯黑海舰队的主要基地和俄罗斯光荣城市——有北约舰船出现。阻止美国人并向全世界展示俄罗斯力量的时候到了！

俄罗斯领导层判断与决策的逻辑也大致如此。至于乌克兰投向西方以及北约力量出现在克里米亚的现实性，却并不值得考虑。各种迹象表明，俄罗斯领导层确实夸大了威胁。然而，从俄罗斯战略文化角度来看，乌克兰事态则属于最严重的挑战，理当予以迅速回应。

如前所述，战略文化以自动或半自动方式激发决策。而关键则是要理解，决策性质和内容取决于战略形势和国际局势评估，也取决于决策者的心理状况。上文提到2008年8月俄格两国“五日战争”期间美国领导层商讨对策的情形。按照美国战略文化一以贯之的逻辑，俄罗斯战争行为被视为威胁，必须尽快还以颜色。但究竟应采取何种形式——军事行动、立即向格鲁吉亚提供军事援助，抑或对俄罗斯展开威胁或制裁，这个问题始终是开放的。问题的解答由形势评估和美国领导人的心理因素所决定。

对于克里姆林宫而言，2013年的乌克兰危机并非首次。2004年，俄罗斯也遇到过十分相似的情况：乌克兰发生了“颜色革命”，反对莫斯科的盟友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当选乌克兰总统。俄罗斯同样将这场革命归咎于美国。为回应乌克兰革命，俄罗斯对乌克兰新政权态度急剧恶化，并展开“天然气战争”，亦即政治与经济手段并用。然而，当时就连对克里米亚采取军事行动的暗示都未有过。

在克里姆林宫看来，2014年的战略形势和国际局势促使俄罗斯采取了更果断的行动。相比2004年，俄罗斯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强大得多，而西方并不准备与之对抗。

且看2014年初克里姆林宫方面对国际局势的判断：苏联解体之后，欧洲对保障本地区安全失去兴趣，也无意动用军事威胁手段。民主程序和民主制度运行缓慢，致使欧洲国家难以有效地反制俄罗斯。一旦欧洲有所反应，俄罗斯已完成

^① Михаил Зыгарь, *Вся кремлевская рать: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С. 767.

收复克里米亚的行动。而欧洲的大宗贸易实际上也有赖于俄罗斯，它不希望失去广阔的俄罗斯市场和有利可图的商业合同。因而西方的回应将是迟缓无力的。欧盟所能做的，至多是对俄罗斯实施有限制裁。但这却不具威慑力，因为时间会帮助俄罗斯。俄罗斯充其量只需要等待，直到西方丧失耐心，不再支持腐败无能的乌克兰。战略忍耐的结果将是俄罗斯赢得胜利。

而克里姆林宫对克里米亚决策的关键环节却在于，如何评判美国可能作出的反应。2008年8月俄格两国“五日战争”期间，正是美国的强硬立场迫使俄罗斯限制军事行动规模，放弃了推翻时任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的机会。相比格鲁吉亚，乌克兰显然是更重要的国家，故而美国势必会有迅速而强硬的回应。但俄罗斯很幸运，2014年的美国总统恰恰是奥巴马。克里姆林宫认为，在对外关系方面，奥巴马政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弱的一届美国政府。这种看法的依据是俄罗斯对美国领导人的心理测评。

2012至2014年间，莫斯科官方曾屡次向到访俄罗斯首都的美国高官施用离间计。俄罗斯反间谍机关采取相应手段，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麦克福尔施加心理压力^①。与此同时，俄方人员仔细观察了美国人的所作所为。

美国既未保护自己的大使，也未公然挑起事端，甚至连一次愤慨都表示过。克里姆林宫认为，美方未作出明确有力的回应，这表明美国领导人心态软弱，面对危机，基本上没有快速果断行动的准备。

有鉴于此，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的行动中，俄罗斯领导层相信，奥巴马政府在心理上准备不足，不会对俄罗斯实行反制（2014年2月和3月，笔者与当时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有过数次交往，他们对时局不切实际的理解令人惊异；直至当年3月16日克里米亚全民公决前夕，他们仍然希望局势发生某种形式的反转）。欧盟也被认为太过软弱，行动迂缓，无力与俄罗斯抗衡。

此外，俄罗斯还决定运用非传统政治手段和信息工具，向西方施加影响并削弱欧盟。为损害西方民主制的声誉，俄罗斯通过社交网络和大众媒体积极开展宣传。俄罗斯动用了包括财政在内的各种资源，支持欧洲的亲俄势力（例如法国的“民族阵线”）。克里姆林宫还试图在欧盟内部建立一个有可能反对制裁俄罗斯的国家同盟（匈牙利、斯洛伐克、希腊和塞浦路斯）。所有这些行动都有同一个目

^① Michael McFaul, *From Cold War to Hot Peace: An American Ambassador in Putin's Russia*. New York, NY: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8, p. 506.

标——削弱欧盟的团结，破坏其反对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意图。

俄罗斯于 2014 年秋季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这成为俄方另一个重要的对外政策举措。俄罗斯干预叙利亚事务基于两个战略目的：其一，重返中东地区，在叙利亚境内建立军事基地，以此影响石油运输线路和石油价格；其二，为了与美国讨价还价而强化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克里姆林宫第二项计划依循的逻辑是：2003 年，美国在中东地区向恐怖主义发起公开的战争；俄罗斯开始在叙利亚与恐怖主义交战，这样即可建立一个共同的平台，以便靠近美国。

由于俄美双方对恐怖主义的理解存在原则性的分歧，这一逻辑被证明是错误的。俄罗斯将任何反对合法政权的势力均视为恐怖主义，中国也持有类似立场。美国则认为，一个国家政权本身也可能是恐怖主义的，那么，所有与之对立的力量也就应当得到认同与支持。

这种立场上的分歧恰好在叙利亚尽显无遗。俄罗斯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并将其敌对者看作恐怖分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认为阿萨德总统才是恐怖分子，因而支持叙利亚反对派。

叙利亚事态耐人寻味，由此可见，不同政治哲学对于协商与寻求妥协的阻碍是何等巨大。

中国在俄罗斯战略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之演变

正如上文所述，俄罗斯战略文化总体上定位于西方，俄罗斯领导层和民众均将本国视为欧洲国家。21 世纪初之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在俄罗斯战略文化中仅仅居于次要地位。在 17 世纪末至 20 世纪末的三百年间，俄罗斯帝国和苏联均以超越中国的欧洲文明代表自居。较之于落后的中华文明，欧洲文明被认为更有活力，也更为成功。

对于苏联而言，欧洲文明优越性的观念还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相较于所有迈向社会主义的国家，克里姆林宫自认为是无可置疑的领导者。此种意识形态的自负，因苏联的经济实力和军事机器而得以巩固。中国领导人不可不承认苏联对领导地位的觊觎之心，这成为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前期中苏两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对抗的根源。

或许（这是笔者的猜想），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介入了这场冲突，该文化将中国视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力量的中心，也是超越西方文明的独特文明和强势文化的中心。

苏中两国冲突中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莫斯科将中国看作军事威胁，而非政治、经济或科技上的竞争者。苏联在经济、技术和对外政策影响力方面领先于中国，似乎是毋庸置疑和无可争议的。而这在当时也被认为是西方（苏联将自己归于其中）对亚洲在文明领域的领先。

出于双重目的，戈尔巴乔夫试图恢复苏中关系正常化。首先，苏联与中国的矛盾耗费了大量资源，这些资源可用于经济现代化；其次，戈尔巴乔夫利用苏中相互接近的契机，以期向美国施加政治压力和心理压力。

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这位原苏联总统亲口告诉笔者：“当我刚遇到与美国的关系问题，就开始转向东方，转向中国。”也就是说，对苏中关系的审视并非自行产生，而是在苏联与西方关系的背景下，以俄罗斯传统战略文化的逻辑为依据。

而反过来说也是合情合理的：中国有意接近苏联，以加强其在与西方交往中的地位。中国因为担心失去意识形态上的近邻，而不希望苏联解体。

20世纪90年代，苏联彻底瓦解，俄罗斯作为其继承者，经历了大规模的政治危机和经济萧条。就在同一时期，中国出现了持续的、极其成功的经济增长，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活跃的经济体之一。中国对外政策的地位显著提升，相形之下，俄罗斯在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却日益衰退。

三百年以来，俄罗斯的东方首次出现了远比它发展更快也更成功的国家。其中首先是中国，但也包括韩国、日本及一系列“亚洲虎”。西方文明领先的观念破灭了。世界经济活力的中心转向了亚太地区。这些大规模的变迁究竟如何影响俄罗斯的文化战略？

现实的可能性往往小于推测。尽管俄中双方不断强化政治经济关系，不断宣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西方却依然是俄罗斯政治与经济的主方向。

某些俄罗斯官方人士向笔者阐说了俄罗斯“转向东方”政策的实质：2014年之前，俄罗斯的主要合作伙伴为欧洲，双方经贸交往并不平衡。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之后，随着制裁政策的实施，俄罗斯与欧洲的经贸关系急剧恶化。俄罗斯由此开始积极发展与亚洲国家而不仅是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在这一阐说中，最主要的是如下两点：

第一，这些官方人士相信，或早或迟，俄罗斯与西方的政治关系将实现正常化，届时，俄欧经济交往将迅速复苏，但俄罗斯方面也将形成经济合作的亚洲坐标。最终结果将是俄罗斯对外交往总体上达到平衡。然而，俄罗斯经济合作仍将

倾向于欧洲而不是亚洲。

第二，俄罗斯精英对欧亚全球协作思想持怀疑态度，此种协作意味着俄罗斯战略文化的彻底改变，以及放弃亲西方的定位。就文化与价值而言，俄罗斯精英一致并且无条件地将自身与西方联系起来。俄罗斯精英不理解中国及中国政治，对其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感到担忧。莫斯科方面意识到，俄罗斯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超过中国对俄罗斯的依赖。莫斯科清楚地看到，任何合作性的组织，但凡俄罗斯与中国同时参加，中国的地位就显得更胜一筹。克里姆林宫暂时只能忍耐这样的状况，却永远不会转而承认中国对俄罗斯的领导地位。

俄中关系又能产生怎样的特质？

俄罗斯与中国：不是敌人，但也不是盟友

俄中关系重归敌对状态，实际上不足为信。两个国家均十分关注双方关系的战略稳定性。两国领导人能够理解对方的心理，思想观念也相近。俄罗斯与中国均奉行非自由的民主思想。两国对人权和恐怖主义的理解是一致的，并且支持对互联网实行严格的国家管控。两国与美国之间关系紧张，虽然其中原因各不相同：中国方面主要是经济原因，俄罗斯方面则因为政治。

俄罗斯与中国正在发展经济合作，尽管这种合作受到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不利影响。除此之外，普京总统亲自过问的所有经济合作项目，全都进展顺利。总体来看，中国在这些合作中显然更强势。俄罗斯对中国市场的兴趣超过对俄罗斯市场的兴趣。

但无论现在还是未来，相近的思想观念、经济合作及政治互信，均不会使中国和俄罗斯成为军事盟友。哪怕是暗示与西方对抗，中国都尽可能回避，将来同样如此。

俄中关系可界定为有限伙伴关系，而且在未来时期，此种关系很有可能仍将是有限的。以下四个因素致使合作停留在有限的范围内：

第一，俄罗斯与中国均为自负的国家，双方中没有哪一方甘愿扮演小伙伴的角色。

第二，俄罗斯在经济上远远弱于中国，这种落后状况会越来越加剧。

第三，俄中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背景。俄罗斯处在与西方的对立中，对中国而言，西方却是最主要的市场。与西方之间的对立严重阻碍俄中两国的经

济关系发展。

第四，俄中双方的相互理解很不到位。由于不理解中国政策的目的是和动机，俄方为之紧张乃至惶恐。中方则一直担忧，俄罗斯迟早将回到西方那一面。

中方的担忧或许不无缘由。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增长、对外政策影响的扩大，令俄罗斯感到恐惧。这种恐惧势必促使俄罗斯谋求对这个与之有着世界最长陆路边界的东方邻国保持均势。均势的筹码有可能是俄方与美、日、韩之间的联盟，这些国家同样有意遏制中国。

现在看来，这不过是远景而已，尽管从某些试图为俄日关系增添动力的举动中，可以发现关于联盟的暗示。这样的联盟不会导致俄罗斯与日本、韩国及美国结为军事同盟。这将是一种具体情境下的有限伙伴关系，仅限于全球某个地区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俄罗斯与美国仍将在其他地区展开竞争。

假想中的联盟并不会导致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冲突，却可能为远东国际关系创建新的平衡。

在不远的将来，情境式的有限联盟将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趋势之一。从比较历史学层面来看，这会令人联想到19世纪的欧洲国际关系，为保持力量的均衡，种种国家同盟参与其中，此消彼长。

然而，在任何情况下，在未来的任何联盟中，俄罗斯都将以一个对亚洲抱有特殊兴趣的欧洲国家而自居。

结 语

俄罗斯传统战略文化形成于三百五十余年间，具有高度的稳定性。甚至苏联消亡也未能摧毁俄罗斯精英的战略思维模式。每当俄罗斯恢复经济与军事实力，就会依照传统的对外政策套式展开行动。

虽则如此，笔者并不打算肯定地说，俄罗斯战略思维在未来时期不会有所变化。其中某些成分无疑将得到保留。这主要是承认俄罗斯为欧洲国家，对于这一点，无论俄罗斯社会还是俄罗斯精英均表示认同。

然而，诸如俄罗斯历史遗产、国民认同、战略忍耐之类的俄罗斯战略文化要素，却可能失去意义，或者产生急剧的转变。

首先，这与全球形势的变化相关：世界发展太过迅速，等待则意味着落后于世界。在新技术的产生相当稀少、运用相当迟缓的19世纪和20世纪，尚可平静

地等待。而置身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 21 世纪，落后数年就可能造成无可弥补的后果。

第二，俄罗斯精英的特征也在变化：当前在俄罗斯掌握权力的是苏联最后一代人，而且是侦查与反侦查机关的前任军官，集中体现着传统战略文化。接替他们的将是成长于新时代、认同新价值观的后苏联一代。

绝大多数俄罗斯官僚精英和财政精英非但不想与西方对立，反而视之为错误。他们倾向于以和平方式与西方之间实现一体化，但不是与东方。

第三，俄罗斯国民认同正在发生重新的认知。当代俄罗斯是一个民族国家，新一代人自认为是俄罗斯的公民与居民，而不是苏联的。一个典型的现象是，俄罗斯年青一代甚至不希望与白俄罗斯合并。他们对乌克兰的命运不感兴趣，也不认为乌克兰人是俄罗斯人。

第四，对“冷战”结果与苏联解体予以局部修正的尝试，受到俄罗斯资源的限制。尽管俄罗斯拥有先进的战争机器，金融体系也相当稳定，俄罗斯经济却停滞不前，社会环境趋于瓦解，基础设施未达现代化，人口日益减少。2014 年的事件既是俄罗斯战略文化的凯旋，同时也是俄罗斯战略力量虚弱的明证。克里米亚的回归足以恢复俄罗斯社会的民族自豪感，但这个社会再也不想得到任何对外政策的胜利，不想与乌克兰联合以及恢复苏联，社会关注仅仅聚焦于内部问题。而且绝大多数俄罗斯精英也不想对抗西方。

因而笔者认为，未来很长时期内，传统俄罗斯战略文化可能会经历一场极其重大的变迁。

(责任编辑 张昊琦)